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5

西周
1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5卷 西周（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發行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張國生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者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六年七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0897-3/J·322

（京）新登字〇五六號

國內版定價 三三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迺松（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李中岳（文物出版社副社長 副總編輯 高級編輯）

李國樑（安徽省博物館副研究員）

吳鎮烽（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研究員）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段書安（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教授）

陶正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郭素新（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國生（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張長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增祺（雲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顧問

楊 瑾（文物出版社社長 總編輯 編審）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楊錫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副研究員）

熊傳薪（湖南省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為《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五卷，選錄岐周、宗周、成周所謂西周三都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岐周、宗周和成周地區青銅器概述

吳鎮烽

周原的岐邑、宗周豐鎬和成周洛邑，是周人滅商之前和西周三百年間重要的三處都城。

周原位于關中盆地的西部，是岐山南麓的山前臺原，海拔九百多米，地勢北高南低，寬緩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宜于農耕，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勞動生息的好地方。

公元前十二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率其族人「自邠逾梁山，遷居岐下」，憑借岐山的屏障和周原優越的自然條件，整治田畝，發展農業生產，營造宮室城郭，設官治民，建立起初具規模的國家，立國號為「周」。經季歷和姬昌（周文王）幾代經營，岐周便成為周人滅商的根據地。

遷都豐鎬，建立起西周王朝以後，岐周作為王室貴族的大本營，並沒有因此而廢棄。這裏有他們的宮室采地和宗廟祖塋，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經常來這裏舉行祭祀、朝覲、冊命、賞賜等重大活動。終西周之世，岐邑的繁榮仍不失為當時重要都城之一，與豐鎬、成周并存。

宗周包括豐京和鎬京，因周王朝的宗廟所在，故稱宗周。豐鎬二京位于關中盆地的中部，今西安市西南十二公里的灃河兩岸。南依秦嶺，北臨渭河，自然環境十分優越。

約在公元前一一三六年，周文王翦滅了灃河西岸的商王朝的諸侯國崇，就其地建立起新都豐京。第二年，文王去世，武王繼位，又在灃河以東興建了鎬京。十多年後，周國推翻了商紂，建立了中央王朝的西周，豐鎬便成為周王朝的國都，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成周又稱洛邑，位于今河南洛陽市洛水北岸，瀍水流貫其間。這裏是西周王朝在中原地區經營的一個政治和軍事中心，西周王朝的東都。

何尊銘文記載，武王滅商之後就有營建洛邑的設想。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不久就發生了紂子武庚聯合管蔡共同叛亂的事情。接着東方的熊、盈等國族和南淮夷也一起叛

亂。在平定了這些叛亂之後，成王以更大規模再建洛邑，營造宮室，「定鼎郊廓」，把俘獲的商王朝代表王權的九鼎搬到成周，遷居殷商貴族，駐屯宿衛軍殷八師，周王朝的許多重臣要員的采邑也分布在周圍。

因此，三都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多，品類繁多，製作精美，銘文豐富，代表了有周一代青銅藝術的最高水平。無論其器型設計，花紋裝飾，銘文書體，鑄造工藝，都具有較為典型的意義，所表現出濃烈的自身特點和時代風格，在中國美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

三都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漢。《漢書·郊祀志》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八年）「美陽縣得鼎獻之」。此鼎即尸臣鼎，當時的經學家張敞識讀鼎銘，並指出此鼎乃西周大臣宗廟之物。漢代美陽縣的故址在今陝西扶風縣法門鎮，轄區約為今扶風、岐山二縣北部，即周原地區。

三都地區歷代都有重要青銅器出土，史不絕書。著名的天亡簋（大豐簋）、大小孟鼎、小克鼎、效尊、效卣、召卣、召鼎、豐卣和毛公鼎等西周重器，都出在這些地區。

但是，對三處都城遺址有計劃地發掘和青銅器的大量出土，則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從五十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曾對岐邑遺址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和發掘工作。岐邑遺址包括今岐山縣的鳳雛、禮村、賀家、董家，扶風縣的黃堆、雲塘、齊鎮、齊家、召陳、莊白、任家、康家、召李、劉家、樊家等村莊，南北長約五公里，東西寬約三公里，總面積達十五平方公里。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又對該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發掘，揭露出鳳雛、召陳等一批大型宮殿（宗廟）建築基址，發掘了數百座西周墓葬和車馬坑，並發現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和許多銅器窖藏。這是西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和新的突破。

據統計，在清理發掘過的西周墓葬中，隨葬青銅禮器的有四十九座（盜掘一空和僅隨葬兵器及小件生活用器者未計入），出土青銅禮器共二百八十餘件。重要的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岐山縣賀家村清理的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銅禮器史𩚑簋、史速角、史速方鼎、尹丞鼎等十七件^①；一九七三年冬，又在賀家村西壕清理了一座豎穴墓，墓室南端有一壁龕，隨葬器物大都放在龕內，這在西周墓中是不多見的，隨葬銅器有乳釘龍紋鼎、乳釘龍紋簋、鳳柱罍等三十五件^②，造型、紋飾都具有晚商作風，器物組合却表現出獨自的特點，時代當為周初或者滅商之前；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劉家村發掘的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饒季遽父為豐姬製作的一組銅器，共十七件，有鼎、簋、鬲、甗、甗、尊、卣、壺、爵、觶等^③；一九七五年三月，在莊白村西南二百五十米清理的一座西周穆王時期的豎穴墓，墓主人被認為是伯戎，出土戎簋、戎甗、戎方鼎、鬲父盃、伯雍父盤等銅器十八件^④，這組戎器和傳世的录戎卣、录戎尊、录簋、伯戎簋、录伯戎簋同屬一人鑄造；一九七六年七月，周原考古隊發掘的雲塘十三號和二十號西周墓，都出土了青銅禮器，共十六件，重要的有𠄎尊、效爵、苟鬲、𠄎卣等^⑤；一九七八年八月，周原考古隊發掘的齊家十九號西周墓，隨葬青銅禮器十二件，有鼎、簋、甗、尊、卣、爵、觶、盤、盃等，除甗較早外，其餘均屬西周中期前段之物^⑥。

自清代道光年間至一九八八年，岐周地區發現的西周窖藏約七十餘起，出土青銅器八百餘件。著名的大孟鼎、小孟鼎就是道光初年（一八二一—一八二五年）出土于岐山縣禮村一個窖藏坑；道光末年（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又出土了天亡簋和毛公鼎等西周重器。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在扶風縣任家村發現的窖藏，出土銅器一百二十餘件^⑦，即善夫克和仲義父器群。《陝西金石志》載：「光緒十六年秋，扶風任村任致遠掘土得之，由蘇子貞運歸潘文勤公，此鼎（指大克鼎）發現之處，若土室，然共得鐘、鼎、尊彝等器七十餘件，唯克鼎、四喜鐘最大，銘文亦二百餘字，惜未詳轉移所在耳。」《貞松堂集古遺文》載：「廠估趙信臣言：此器（指大克鼎）實出岐山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趙君嘗為潘文勤公親自至任村購諸器，言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鼎、克鐘及中義父鼎并在一窖之中，時光緒十六年矣。」這批銅器出土後分散賣出，國內外均有收藏，見于著錄的有三十九件，計克鐘五、克罍

一、大克鼎一、小克鼎七、師克盃一、善夫克盃一、仲義父鼎三、仲義父作新客鼎五、仲義父鑑二、仲義父盃二、仲姑鬲十件。

一九四〇年任家村再次發現銅器窖藏，據說窖大若窑洞，銅器疊壓放置，共百餘件^⑧。窖藏的主人是善夫梁其或善夫吉父。銅器出土不久，當事人便把一百二十八件密藏在岐山賀家村賀某家，一九四二年以後陸續賣出，故有一九四二年出土之誤傳。這批銅器見于著錄的僅三十一件，梁其鐘六，梁其鼎三，梁其簋五，梁其壺、伯梁其盃各二，善夫吉父鬲四，善夫吉父盃、善夫吉父簋、吉父鼎、吉父匜、束鼎、嬭鼎、禹鼎、弦紋鼎、無銘鐘各一。伯吉父銅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亦曾出土一批，共九件，窖藏坑位于建和鄉北橋村^⑨。

一九三三年夏，上康村農民康克勤父子在村東挖土時發現一窖青銅器，即函皇父和伯鮮器群，出土時銅器相互疊放在窖內，有一百多件^⑩。挖出後，康氏父子賣掉一批，埋藏了一批。後來，土匪搶劫銅器將康氏父子殺害，故埋藏的那些銅器至今不知所在。賣掉的銅器見于著錄的二十餘件，有函皇父鼎、函皇父簋各三，函皇父壺一，函皇父盤、函皇父匜、函父仲簋各一，伯鮮鼎三，伯鮮盃四，伯鮮甗、伯鮮匜、鮮鐘、鱗紋簋、鱗紋方甗各一。另外，清代還出土過一次函皇父器，有二簋一匜。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在齊家村東先後發現五個西周銅器窖藏。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兩窖相距不遠，前者出土官鬲和波曲紋盃各二件^⑪，後者出土官盃、官盤、日己尊、日己觥和日己方彝等六件^⑫。日己器造型優美，觀賞價值頗高，是西周中期難得的藝術珍品。兩批銅器有共同的作器者「官」，應是一家之物。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兩窖相距較近，為一家所藏，前者出土周我父簋三件^⑬，後者出土周我父簋蓋及波曲紋方座簋等七件^⑭，其中三件簋蓋與周我父簋璧合，花紋一致，銘文相同。一九六〇年的一窖系考古工作者鑽探發現，隨後進行了發掘，共出土銅器三十九件^⑮，其中二十八件鑄有銘文，重要者有幾父壺、柞鐘和中國義鐘等。

一九六〇年春，召陳村農民陳志堅在村西南發現一個銅器窖藏坑，出土伯車父諸器十九件^⑯。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強家村發現的銅器窖藏出土師觚鼎、師承鐘、即簋、恆簋蓋等七件^{①⑦}。師觚鼎形體高大，簡樸少紋，是西周大鼎之一。

一九七六年春，周原考古隊在雲塘村發掘了兩處銅器窖藏，出土伯多父盃、伯公父爵等九件禮器^{①⑧}；次年八月，在上述窖坑之南約二十米處，又發掘了一窖藏，出土伯公父簋一件^{①⑨}。兩窖銅器是一人所藏。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岐山縣董家村發掘的一個銅器窖藏，共出土禮器三十七件^{②⑩}，有銘文者三十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裘衛四器和倅匜。榮有司卣銘文與一九七三年賀家村（董賀二村相鄰）一座周墓出土的榮有司卣銘文除改「鬲」為「鼎」外，餘均相同，當為一人所作。同墓出土的兩件伯車父盃與扶風召陳窖藏的散伯車父也應是同一人，由此可知這些器主之間的關係。

七十年代最重要的發現，是一九七六年冬季在扶風縣莊白村發掘的微氏家族銅器窖藏坑，出土青銅器一百零三件^{②⑪}，有銘文的七十四件，可以確定為微氏家族的旂、豐、牆、癉等四代或五代人製作，其中最重要的有牆盤，另外，商尊、商卣、旂尊、旂觥、旂方彝、則人守門方鼎、龍鳳紋斗亦頗具藝術價值。

豐鎬遺址早在一九三三年就進行過勘查。五十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大量調查和發掘工作，得知豐京遺址包括灋河西岸的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大原村、新旺村、曹家寨一帶，總面積約六平方公里。在客省莊和馬王村東發現了十四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寬闊的西周道路和排水設施。鎬京遺址包括灋河東岸漢昆明池舊址以北的斗門鎮、白家莊、花園村、普渡村、泉北村、洛水村等村莊，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八十年代，在灋東也發現了十多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發掘的五號建築基址總面積達二千一百二十四平方米，其規模要比岐邑鳳雛宮殿（宗廟）建築基址、召陳宮殿建築基址和灋西客省莊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大得多。它的發現，揭開了豐鎬考古新篇章。

歷年來在灋西的張家坡、大原村、客省莊、馬王村和灋東的普渡村、花園村等地清理發掘的西周墓有五百餘座，車馬坑二十餘座。從發表的資料統計，銅器墓有五十三座，出土銅禮器

樂器一百八十四件。如：

一九六二年張家坡一〇六號墓，時代為西周早期，隨葬銅器七件，有父丙祖辛鼎、乳釘簋、父乙尊、父乙爵、父己觚、父戊觶、直內戈等²²；一九六七年八十七號墓亦屬西周早期，出土銅禮器九件，有鼎、簋、尊、卣、爵、觚、斗等²³；而十六號墓僅出土獸面紋爵、龍紋觶和直內戈各一件²⁴，這是一座周初墓，以爵、觶隨葬與殷商以爵、觚隨葬有別。

一九八三年在張家坡發掘的豐毛一號墓，隨葬獸面紋鼎、乳釘紋簋各一、雕內戈二、弓秘一、鏃四，另外還有陶鬲和陶罐²⁵。隨葬銅禮器一鼎一簋，沒有酒器，與安陽殷墓不同，應是周人習俗。特別是高領袋足陶鬲，在寶雞門雞臺、岐山賀家村和鳳翔西村都曾出土過，被認為是先周文化遺存。因此，這座墓的時代應在滅商之前。這種以食器鼎、簋為組合的銅器墓，在豐鎬地區發現較多，有的時代可晚到西周早期。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在張家坡村西發掘了井叔家族墓十多座²⁶，形制都較大，其中一五七號墓最大，呈中字形。這些墓都遭到嚴重盜掘，劫餘之物有銅、陶、瓷、玉石和骨牙器千餘件。青銅器大多是車馬器，禮樂器僅餘八件，均出自一六三和一七〇號墓，有鄧仲犧尊、井叔鐘、井叔方彝等。鄧仲犧尊是西周青銅器中難得的藝術珍品。

一九五四年在灋東普渡村發掘的一座西周中期前段墓，出土青銅禮器二十一件²⁷，其中長由器四件，長由盃銘文有「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泃」，是穆王時期的標準器。

一九八一年冬，在灋東花園村發掘的兩座并列的銅器墓²⁸，隨葬品相當豐富。十五號墓出土青銅禮器十三件，有歸虢進方鼎、禽鼎、弦紋簋、歸爵各二，庶父尊、庶父卣、戎佩尊、戎佩卣、觶各一；十七號墓出土青銅禮器十六件，有設簋、爵各二，歸虢進方鼎、伯鼎、伯姜鼎、歸虢進卣、歸虢進方壺、歸虢壺、作彝尊、作彝卣、公盤、公盃、觚、觶各一。這是夫妻并葬墓，屬西周中期前段。兩件設簋作于昭王之世，記載設隨昭王征伐楚荆事，藝術價值亦高。

豐鎬地區的銅器窖藏較周原地區少得多，據統計僅有九起，出土銅器九十六件。

一九六一年十月，在張家坡村發掘的一座窖藏，出土青銅器五十三件²⁹，有孟簋、師旌

簋、伯喜簋、伯梁父簋、伯庸父鬲、伯庸父盃、伯百父盤、伯百父鑒和荀侯盤等。其中荀侯盤爲姬姓媵器，可知窖藏主家族非姬姓。

一九七三年五月，又在灋西發現了兩個銅器窖藏，一窖在師旅器群窖藏之西三十米，出土衛鼎、衛簋、是婁簋等二十九件^③；另一窖在新旺村，出土一鼎一盃。兩件銅器都比較大，勾連雷紋鼎高八十五厘米，是西周早期重器之一；波曲紋盃高四十一厘米，是西周晚期之物。

對於這些窖藏青銅器的埋藏原因和年代，過去曾有人進行過推測，郭沫若先生認爲有可能是厲王奔彘或幽王滅國之時埋藏的。五十年代以來，周原和豐鎬地區發現的銅器窖藏，大多數經過了科學清理發掘，對窖穴的層位、年代及和其它遺存的關係，有了不同程度的瞭解。這些窖穴的開口都在周代晚期文化層，一般呈圓形或長方形，坑壁基本不加修整。坑內的銅器一般全是禮器，有的又出樂器，但絕無兵器和車馬器。器物放置較亂，大小套合，層層疊壓，井然有序。銅器非一時所作，年代的下限多屬夷厲時期，有的遲至共和或者更晚，這也是埋藏于西周末年的有力證據。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些窖藏的附近多有西周建築基址發現。這些建築基址，應該就是器主的宅第。另外，西周王朝的東都洛邑，至今沒有發現這類銅器窖藏，也支持了上述看法。

成周所在地的洛陽，長期以來也不斷有重要西周銅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簋、令方彝、士上尊、士上盃、保尊、保卣等都出在這裏。這些銅器幾乎都出自墓葬，未見有發現窖藏的報道。

成周地區的西周墓，主要分布在灋水西岸的龐家溝和北窰村一帶。這個墓地面積達二萬五千平方米，二三十年代曾被嚴重盜掘過，絕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然而，在劫掠之餘仍有一些重要發現。

五十年代開始配合基本建設，陸續在這一帶清理發掘了四百多座西周墓，同時還發現了車馬坑，出土有太保戣戈、豐伯戈、豐伯劍數件，以及毛伯、康伯等人的青銅器^④；一九六四年發掘的一號墓雖遭盜掘，劫餘之物還有獸面紋鼎、獸面紋簋、餅紋甗和邑觶等五件青銅禮器，均西周早期之物^⑤；四一〇號墓盜後所餘青銅器有史唃鼎、考母簋、考母壺、考母鬲等六

件^{③4}。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一年分別在白馬寺附近和北窰村發掘了兩座未被盜掘的西周早期墓。前者隨葬有射甗、射尊、射爵，以及鼎、簋、觚、觶、戈、斧等青銅器十一件^{③5}，後者出土了鼎、簋、尊、卣、觚、觶、斚、斚等青銅器十件^{③6}，其中七件有銘文，作器者名彝，當為死者。

另外，相傳一九二八年洛陽馬坡出土的青銅器總數約六十至一百件^{③7}，有可能都是出自龐家溝——北窰村墓地，見于著錄的有作冊大方鼎三件，令簋二件，令尊、令方彝、士上尊、士上卣、士上盃各一件，以及臣辰父癸鼎、簋、盃、爵，臣辰父乙鼎、簋、尊、卣、爵，臣辰父簋、壺、盤、盃等四十餘件。這些青銅器是從幾個家族墓塋盜掘出來的，都是西周早期之物。

一一

青銅器，特別是青銅禮器，是貴族享用的藝術品。岐周、宗周和成周是西周王朝統治的中心，王室成員和王朝重臣集中居住的地方。因此，出土的青銅器數量最多，造型設計和花紋裝飾水平最高，是西周時期青銅藝術的典型代表。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大都因襲商代晚期的作風，同時在器類上和造型設計上有一些新的增損和改進，在鑄造銘文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就器類而言，食器有鼎、簋、鬲、甗、豆、孟（有的孟自名為饋孟，當為食器）；酒器有尊、卣、爵、觚、觶、觥、斚、方彝、壺、壘、斗，同時出現了角；水器有盤、盃、壺、孟、壘；盃本為酒器，此時也演變為盥洗器，與盤配合使用；樂器中鐃消失，甬鐘出現；兵器除有戈、矛、鏃、弓、矢外，新出現了勾戟和短劍。

從總的趨勢來看，周人大大地削減了酒器的生產，而着重鑄造食器。周初鑒于商朝統治者酗酒亡國的教訓，對於飲酒設立了種種限制，以糾正社會風氣，大盂鼎銘文就曾提到這一點。

早期周墓隨葬銅器的組合，也是注重食器。常見的是以鼎、簋為主的食器組合，身份較高

的貴族墓是食器和酒器并舉的組合形式，食器仍以鼎、簋為主，有的出現鬲、甗。鼎、簋數目多寡以身份高低變化；酒器或有尊、卣，或有爵、觚，或兼而有之，但數量不多。另外，也有少數單獨以爵、觚或爵、觶隨葬的現象。這種以純酒器組合的形式顯然是承襲殷人的作風，但需要指出的是，以爵、觶組合從不見于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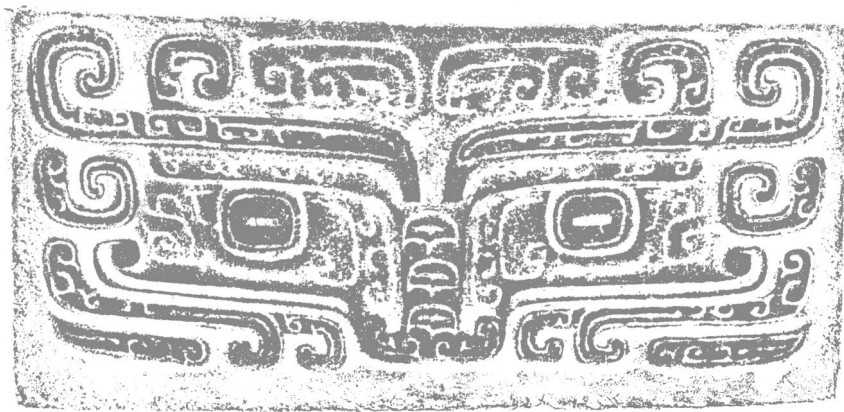
早期後段，鬲、甗作為重要的禮器加入食器組合的現象更加普遍，一些高級貴族也開始隨葬成套盥洗器和編鐘，出現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同時存在的組合形式。

這個時期，圓鼎的造型均為柱足，但不如商代的粗壯，有的足根附飾浮雕獸面。這種獸面柱足鼎最早見于殷末，如戊嗣子鼎，西周早期它的形制更加成熟，特別是大型鼎，如外叔鼎、大孟鼎、勾連雷紋鼎等是其代表。早期後段，圓鼎的下腹開始向外傾垂。這種變化是一種時代風尚，同期的尊、卣、觶、簋許多器類都受其影響。方鼎體槽變淺，上下有收分，雙耳微侈，柱足較細，沒有商代晚期那種凝重厚實的感覺。早期後段還出現了附耳方鼎。分檔鼎比晚商更加流行，但分檔愈來愈淺，袋足幾乎徒具形式。如岐山賀家一號墓出土的尹丞鼎、長安張家坡八十七號墓出土的分檔鼎等。

鬲的形制以立耳束頸式為主，周初的鬲腹較深，分檔明顯，其後鬲腹變淺，柱足較細；早期後段的鬲腹外鼓，柱足較矮，分檔已不明顯，或者變成弧檔。另外，還有一些附耳袋足鬲，斜沿立耳鬲和無耳平沿鬲。鬲的口沿一般等于或大于腹徑。

甗仍以連體式的為主，主要變化在于甗部較商代為淺，鬲部升高，二者寬度較接近。從整體看，趨于穩重。早期後段出現橢方形復合式甗，目前僅見洛陽出土的師趯方甗和父辛方甗，形體由上下兩器組成。上器是侈口附耳或獸首耳的橢方形甗，下器是一個附耳方鼎，兩者有子母口套合。

簋的變化比較明顯，不僅數量增多，式樣也翻新。商代晚期出現的侈口鼓腹雙耳簋繼續流行，獸耳亦多變化。乳釘紋無耳簋成康以後被淘汰。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方座簋、高足簋、四耳簋和四耳方座簋的出現。所謂方座簋，就是將簋體和方禁連鑄在一起，最早見于寶雞林家村先周墓，流行于西周早期。武王時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時的德簋、叔德簋，昭王時的諶簋、令



獸面紋

簋等，都是這一簋型的代表作。簋和禁連鑄的用意有三，一是提高簋的高度，以適應席地而坐就食之需要，二是增加簋體的穩定性，三是爲了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高足簋、四耳簋和四耳方座簋，都是從這一設計思想出發的。高足簋就是爲了擡高簋體，有的將四耳的珥延伸成四足，將簋體懸起，有的在圈足上再加上四個較高的支足，有的支足呈卷鼻象首形，有的呈圓柱形，有的呈獸蹄形，不一而足。

此期盛行觚形尊，筒狀，三段式，腹和圈足所佔比例相當，口徑略大于腹徑，圈足下沿往往有寬闊的邊條。豪華型的通體鑄有四條扉棱，紋飾富麗。何尊、商尊、旂尊、令尊都是這種型式。早期後段，尊腹下移，圈足變矮。商代晚期廣爲流行的大口折肩尊周初就已消失。

提梁卣的造型仍沿用殷末的式樣，蓋鈕全爲花苞形，有的提梁仍作扭索狀，提梁兩端沒有獸頭。但自成王時期開始，兩端鑄有獸頭的扁體提梁卣大量流行。和尊一樣，豪華型的通體有四條扉棱，并裝飾着繁縟的花紋。早期後段，蓋鈕大多變成圈狀，蓋的兩端出現「犄角」，器體趨于低矮。此時，提梁卣往往是成對出現，一大一小，形制、花紋、銘文相同，與尊組成一尊二卣的一套酒器。這種大小相配的形式在商代沒有見過。

早期的爵全爲卵形腹，流窄而長，前端高于後端，雙柱也離開流折。平底淺腹式爵已經絕跡。早期後段，爵鑿由扁平變得圓渾，給人以窄細的感覺。

觶的型式以圓體爲主，橢圓體的少見。早期前段，圓體觶頸較短，腹圓鼓；早期後段，頸修長，腹變小而下垂，圈足外侈。

早期的觚數量銳減，式樣有兩種。一種沿襲晚商風格，但腰部變長，一般沒有棱脊；另一種是新型的，腰部極細，狀似喇叭，紋飾只施在圈足，如扶風莊白出土的旅父乙觚、鱗紋觚等。這種觚殷墟從未出土過。

罍不但數量少，型式也單一化，只有高領分檔式，平底罍、罐形罍均不見鑄造。觥都是方體的，觥和方彝的腹變得較曲。方尊、方壺前段還有鑄造，後段極爲少見。

早期的花紋，種類與商代晚期差不多，主要有獸面紋、乳釘紋、龍紋、鳳鳥紋和火紋，其次有直條紋、聯珠紋、獸體變形紋，以及蟬、蛇、象等紋樣。



羽脊獸面紋

花紋裝飾一般採用平雕和浮雕的手法，以地紋襯托主體紋的形式，形成主次效果。象何尊那樣的豪華藝術品還採用了高浮雕，將獸角突出器體之外，以增加立體感。

這個時期流行通體滿花和三層花。所謂三層花，就是既有地紋，又有主紋，同時在主紋上重疊刻花，層次分明，繁縟富麗。圖案多採用對稱式適合紋樣和連續紋樣。對稱式適合紋樣是以等分面的中軸或庠棱為裝飾的中線，花紋由左右向中心聚集，形成直立狀對稱，以達到穩定的效果。連續紋樣有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以二方連續為最多。這種紋樣，頭尾相接，連續展示，富有一種規律性節奏感。

商人重視鬼神，對於宗教鬼神採取了狂熱的態度，銅器上各種幻想中的怪誕動物紋樣，則更形象地反映了他們對鬼神的崇拜。周人比較現實，尊禮尚德，對鬼神敬而遠之，在繼承商代紋飾方面也採取了選擇和改造的辦法。商代常見的那種極端怪異的紋樣，在周初青銅器上始終未見。

獸面紋的主要特徵雖然保留，但也有一些變化，構圖疏朗，線條柔和，給人的感覺沒有商代晚期那麼威嚴可怖。殷墟時期出現的軀幹的脊背上飾以豎立狀羽毛紋的獸面紋，到了周初，除鼻梁、眼睛之外，軀體由三列雷紋組成，並伸長成帶形，上列的羽毛成列旗狀，少則四五個，多則二十多個。這種獸面紋流行的時間很短，成康之後便銷聲匿跡。這種羽脊獸面紋，也影響到同期的龍紋。

鳳鳥紋在周初得到了大發展，不但數量增多，並且從過去的條帶狀配飾，轉變到主題花紋上來了。種類除晚商的多齒鳳鳥、長冠鳳鳥和彎角鳳鳥紋繼續流行以外，體形龐大、構圖華麗的花冠大鳳鳥開始出現，並佔據器物的主要部位。如長安花園村出土的昭王時期的該簋，通體以各種姿態的鳳鳥裝飾，最引人注意的是兩耳的圓雕鳳鳥和器腹的四隻花冠分尾大鳳鳥，兩兩相對，回首顧盼。這種以鳳鳥為飾的風氣，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特別盛行于穆共之世。

鳳鳥紋在西周大量出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馬承源先生認為它和「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山」的傳說有一定關係。鸞鷟即鳳凰。鳳凰在古代人們心目中是吉祥之鳥，它既是風神，又是傳達天命的使者。周人以善于經營農業而著稱，把鸞鷟當作他們的保護神和命使加以崇



鳳鳥紋



龍紋

拜，并繪鑄在青銅禮器上當是情理中事。

西周早期最富特徵的紋飾是蝸體獸紋，天亡簋、從簋和岐山賀家一號墓出土的獸面紋壺的肩部都是這種紋飾。這是周人的創作，從不見於商器。這種蝸體獸紋，過去亦稱夔龍紋，但形象與一般的龍紋不同。其形狀頭大體短，身尾盤旋作蝸牛殼狀。頭似龍首，長鼻上卷，口中露出上下交錯的獠牙，頭頂有一根觸角，龍頭之下由蝸殼中伸出一隻利爪。這種龍頭蝸身的幻想中的怪誕動物紋飾，是以蝸牛為祖型，而加以變化的結果。馬承源先生考證，這種紋飾當為《山海經》和《淮南子》中所記載的，我國古代神話中危害甚大的吃人怪獸猼訑。傳說中的猼訑，與蝸牛的別名蜺蜎讀音相同，其特點是龍首、虎爪、迅走、食人，和蝸體獸紋的龍頭、觸角、利爪，又有一對食肉動物的獠牙的形象特徵相合。蝸體獸紋周初出現，時代性頗強，大約流行在武成二世，康昭時期的青銅器上已不再見了。

銘文比晚商有了顯著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長銘數量增多和書史記事性質的加強。商代的銘文字數不多，一般五六字，最長的也沒有超過五十字，銘末多有族徽。西周早期數十字的長銘則是普遍現象，武王時的天亡簋七十六字，康王時的大孟鼎二百九十一字，小孟鼎多達四百餘字。商代銘文的內容主要是標識器主和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現了幾篇記有錫命和紀事的銘辭；而西周早期的銘文，除標識器主和祭祀親屬外，最主要的還是紀事。周人把青銅器鑄銘當作宣揚個人與家族榮耀和地位的工具。銘文格式也比較活潑。

銘文書體總的風格是清勁雋美，筆道首尾出鋒，有明顯的波磔，結構嚴謹精到，行款章法自如。成王時的何尊、保卣，康昭時的外叔鼎、大孟鼎、令簋、旂觥銘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書體。另外，早期還流行一種風格質樸平實，結體不用肥筆，不露或少露鋒芒，書寫便捷的書體，其代表作品是武王時期的利簋和天亡簋銘文。

西周青銅藝術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到西周中期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加成熟的階段。早期那種帶有濃厚殷商文化特點的藝術風格，逐漸被一種獨特清新的藝術所替代。中期前段即穆恭二世是這種轉變的重要時期，無論是造型設計，還是紋飾構圖，都在發生巨變。這種轉變是意識形態變化在青銅器藝術上的一種反映，岐周、宗周和成周的青銅器表現最為明顯，同時也影響